



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

中国文化地理

王恩涌 胡兆量 刘岩 编著
周尚意 赫维红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之一。全书分为历史文化篇、专题文化篇和区域文化篇共三篇十九章。历史文化篇包括第一至第七章内容,着重从中国地理环境分析其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文化方面的联系;专题文化篇包括第八至第十一章内容,论述了中国语言、宗教、民俗和建筑文化;区域文化篇为中国各区域文化概述,包括第十二至第十九章内容,分别阐述了中国文化分区原则和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7大文化区概况。本书特色在于有历史文化部分、专题文化部分和区域文化部分。这与其他文化地理著作有不同之处。它表现了地理在历史文化中的作用、区域的分布,表现了与地理环境有关联的那一部分文化,而不包括文化的所有方面。

本书可供地理、文化、历史、宗教、区域研究等有关科研、教学人员参考使用,亦可供广大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地理/王恩涌等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

ISBN 978-7-03-021053-1

I. 中… II. 王… III. 文化地理学-中国 IV. G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6216 号

责任编辑:吴三保等/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钱玉芬 /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1 月 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8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印张: 23

印数: 1—3 000 字数: 517 000

定价: 6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胡焕庸 周立三 宋家泰 钱今昔

主 编 吴传钧

副主编 郭来喜 (常务) 王恩涌 许学强 陈宾寅
沈道齐 李润田 吴三保 黄效文 陈宗兴
邬翊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希贤	王 铮	王兴中	王恩涌	刘 毅
刘君德	刘继胜	邬翊光	张文尝	张小林
张家楨	张绍飞	张耀光	许学强	陆大道
陆俊元	吴三保	吴传钧	吴楚材	吴建藩
李小建	李文彦	李润田	李振泉	陈 航
陈宗兴	沈伟烈	沈道齐	杨吾扬	邹逸麟
周一星	周尚意	周钜乾	金其铭	金学良
姚士谋	姚岁寒	郭来喜	郭焕成	黄效文
崔功豪	鲁 奇	谢香方	谢让志	彭 斌
蔡人群				

学术秘书 陈 田 毕金初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认识到它的核心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整体，加以优化和调控的可能途径和对策，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在很多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中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论述，认为人地关系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思想的渊源。比较系统的论述则见于历代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各类地方志和游记中，涉及面广，但零星而分散，又和其他学科交错在一起，因而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个性是不明确的，只是知识和资料的积累过程。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近代人文地理学才随着其他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我国派往欧美的留学生而陆续引进。此后在大学中设置地理系，成立地理学会，并建立了专业的地理研究所，广泛开展近代人文地理学的讲授和调查研究，但限于经费，工作规模小，出版成果少。

解放后，地理工作者得到了良好的工作条件，配合各项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但在初期的十多年中，国内各项工作都向原苏联学习，我国地理学基本上也按原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引进了不少原苏联地理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农业区划、经济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等，加快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现代化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即三四十年代原苏联地理界在当时左的政治干预下，把人文地理学当作唯心主义“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也引入了我国，致使我国人文地理学中一度出现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而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被视为禁区的极其不平衡的状态。同时原苏联地理学强调发展二元论，把它肢解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门属性不同、互不联系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大转变，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人们敢于从教条的、空洞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重新评估和认识人文地理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差异性大，加以历史悠久而变化大，近年又处于改革阶段，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这就为人文地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发展人文地理具有天赋的优越条件。1980 年初，中国地理学会因势利导，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号召，并相应地成立了专业委员会来组织、推动、交流人文地理研究。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决定在各大学地理系中开设人文地理课程，个别大学还成立了专业的人文地理研究所，出版《人文地理》学术期刊，很多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地理工作者踊跃投入到人文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原先被冷落的一些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现在已成为热门；原先被视为禁区的一些分支，现在有人敢于钻研；至今尚无人问

津的一些新学科，也有人开始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文地理学确实已走上复兴创新的道路。

今后的发展，总的目标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这就要求联系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际，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的一些具有明显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问题，主题是协调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大量实践，逐步总结我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各项人文地理研究工作取得的有效经验，系统建立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生前曾主张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即：一要有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科学家；二要有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三要应用具有本门科学特点的方法；四要在为国民经济服务中发挥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的作用；五要有大量本门学科的成果资料的积累。这五方面的尺度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成果出版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显然是最具体的衡量。

为了系统展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成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合作，计划组织人文地理学界合力编写一整套《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包括人文地理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争取于近几年内陆续出版。这在学术上无疑是对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阶段总结，还可和80年代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相匹配，完善对中国地理的研究。甚望通过《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出版，把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A large, bold, black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reading '吴建利' (Wu Jianli).

1998年中秋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新世纪迤降，纪元晋双千，地理学发展迈入多元多维结构的全息化时代。向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既表征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意义重大，又展示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强大生命力。

若把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5与16世纪之交航海引起的地理大发现，视为地理研究空间的大拓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激发了推动力，从而导致近代地理学的萌发，那么500年后的今天，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历史时期，航天地理学应运而生，“人地关系”将进一步演变为“人宇关系”，可以预见21世纪中期，将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应。人类的“天地生人巨系统”观会赋予地理科学研究全新的内涵，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将推动地理科学产生巨大的变革，不过人地关系仍将是研究的基础。

人文地理学是以研究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变化规律和地域分异系统为基本宗旨。作为世界上最高智能动物群体的人类，从其诞生之时，就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人类的繁衍与发展既受人类社会形态与结构的支配，也受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有的学者把地理演化史分为天文时期、地文时期和人文时期，而人文地理学则是研究人文时期的人地系统，亦即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形成、演化、地域分异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人地关系论（man-nature relationship）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在古典地理著作中便有所论述。《山海经》、《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我国古典地理学发轫期的杰出代表作。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中，对人地关系先后产生了早期的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思想、天人相关论以及因地制宜等不同流派。尽管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乃至唐代刘禹锡主张人地相关论等，对人文地理学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从而阻碍了人文地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近代科学。

近代人文地理学萌生源于西方国家。德国地理学大师李特尔（Karl Ritter）堪称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他最早阐述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和统一性，主张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应从观察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和假设出发，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他在《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1822~1859）这一著作中，探讨了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嗣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定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同时，又主张由于有人类因素，地理环境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1882, 1891）、《政治地理学》（1897）、《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1901）、《民族学》（1885, 1886, 1888）、《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1901, 1902）等，对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

影响，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所有对人文地理有贡献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19世纪后半期德、英、法、美、俄等国学者在阐述人地关系时，先后出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以 F. 拉采尔、E. 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E. 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代表；“二元论”（dualism）——以 O. 佩舍尔（Oscar Peschel）、F.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和 A. 彭克（Albrecht Penck）为代表；“或然论”（possibilism）——以 P. 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吕纳（Jean Brunhes）和 G. 弗勒（Herbert G. Fleur）为代表；“适应论”（adaptablism）——以 P. 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为代表；“文化景观论”（cultural landscape theory）——以 O. 施吕特尔（Otto Schlüter）、S. 帕萨尔格（Siegfried Passarge）和 C. 索尔（Carl Owtwin Sauer）为代表；“协调论”（adjustablism）又称“和谐论”（harmony）——以 B. A. 阿努钦（Всеволо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учин）、M. 怀斯（Michael John Wise）为代表。这些学术流派先后传播到中国，对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自16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殖民地不断扩大，伴随这种大扩展，一批批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不少新的地理知识。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ui, 1552~1601）、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1649）、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 1559~1654）、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法国人白晋（Joach Bouvet, 1656~1720）、杜德美（Petrus Jartoux, 1668~1720）、蒋友仁（Michael Benoist, 1715~1774）等。19世纪以来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考察，对中国地学（包括人文地理）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斯文·海定（Sven Anders Hedin, 1866~1952）、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n, 1870~1946）与德日进（Teilard de Chardin Pierre, 1882~1955）等。

20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家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人文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自然会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既是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者，同时又是开拓人文地理研究的先驱。他的《地理与文化之关系》（1916）、《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1922）、《天时与战争之影响》（1923）、《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1926），是竺老早年对人地关系之论述。丁文江先生的《关于中国人文地理》（1923），张其昀先生的《中国人之传统》（1926）、《人地学论丛》（1932）、《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1935）、《论中国之人地关系》（1947），翁文灏先生的《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1929）和《中国人口之分布与土地利用》（1932），胡焕庸先生的《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1934）、《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安徽之人口密度与农业的区域》（1934），黄国璋先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1941），李旭旦先生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王成组先生的《人生地理学的派别问题》（1941），周立三先生的《农业地理》（1942），吴传钧先生的《中国粮食地理》（1942），陈尔寿先生的《重庆都市地理》（1943），任美镠先生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等等，对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学建设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以刊物为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季刊，1942~1949年共出6卷，发表论文136篇，其中人文地理学论文即有56篇，若把地理学通论、地理学思想史、区域地理、外国地理、地理教育等论文计入，则人文地

理论文居于绝对优势，这种格局和国外地理学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学名著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30年代初王海初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等所著《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30年代中任美镠、李旭旦先生翻译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La Géographie Humaine)，陈健民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葛绥成先生翻译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的《环境与人》(Environment and Race)(也译为《人种地理学》)等，在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起过不同的作用，特别是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所提出的人类在地球表面所做的事业按三纲六目人地学基本事实来阐述，并指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也可影响地理环境，影响程度随科技发展水平而异。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作用是相互的，而人类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在中国影响十分深刻。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造就“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大气候，在地理学界，尽管对推动现代中国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场劫难。某些人把原苏联30~40年代非常时期的学派之争，生搬硬拉强加于中国地理学界，且无限上纲，恣意扩大，以致把人文地理学赶出学术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悲剧！

记得1955年正当批判人文地理学高潮迭起之际，我在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称作“人文地理学批判”，它不是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某种学术观点、思想和流派，而是批判这门学科，并给予全盘否定，满篇都是政治大帽子，诸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为帝国主义服务”、“伪科学”等等，给当时青年学子们纯洁的心目中，造成了“人文地理学”与“恶魔化形象”等同的极坏影响。这样，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大地上便无立锥之地，被逐出地理学界。那时老师授课无讲义，更无教科书(也许奉命而教，违心讲授)，我的笔录较详，还被一位报考留苏同窗借去参阅。嗣后我赴莫斯科大学学习，并没有感受到像国内那样剑拔弩张的学术氛围。实际上，当时苏联地理界已在起变化，随即出版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导致苏联统一地理学的复兴，出现了地理学的生态化，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化，并以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名义在苏联恢复了人文地理学。

极左思潮在地理学界某些人群中泛滥，造就一些专门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学术新贵”，直到中苏关系破裂若干年后还在肆虐，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践踏和蹂躏。“文化大革命”中连经济地理学也不复存在，研究队伍被迫改行。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堪称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300多位地理学家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收到900多篇论文。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李旭旦先生的《人地关系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和吴传钧先生的《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又名《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揭开了我国复兴人文地理的序幕，迎来了人文地理学的春天！

李旭旦先生在报告中指出：“30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部门都得到长足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一花独放，这个局面似应有所改变”。李先生进一步阐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疾病地理等，近年西方国家还出现感应地理、行为地理学科，内容极为丰

富。人类除经济生活外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也不限于生产配置，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因此，李先生疾呼：“应该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决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期西方各国的各种人文地理学流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今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理论题等”。

如果说在复兴人文地理学中，李旭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那么，吴传钧先生则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组织家和实践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吴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工作（20世纪80年代扩展为经济地理研究部），则在经济地理的大旗下，掩护发展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领域，除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外，还有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世界地理等，一个研究室竟有近60名研究人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传钧先生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地理学研究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重点在于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落实到地区综合发展基础上，探求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主要内容包括：①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结构和发展趋向的理论；②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与风险分析；③两大关系间相互作用和物质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整的途径与对策；④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⑤根据一定地域人地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以及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结构潜力，预测特定的地域系统演变趋势；⑥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⑦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从而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目标与研究方法，使人文地理研究得以升华。

我清晰地记得，李旭旦先生做完学术报告后，1980年元旦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召开敬老座谈会，出席会议的12位70岁以上的老地理学家（如今大多作古）中，有不少多年没有参加过全国性学术会议，出席广州盛会激动不已，座谈时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董绍良先生说：“我20年代就接触人地相关论，这次会上听大家谈人文地理学，我真像遇到久别的老友一样，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为了繁荣人文地理学而勇于创新”。

然而就在会后不久，有着失落感在“文革”中又自命为“红线代表”的某位以批判他人出名的人物，在座谈会上做了肤浅应景式检讨和言不由衷的道歉后，竟又炮制新的“批判”大作，罗织罪名，妄图把复兴人文地理之举，当作“回流”、“复辟”、“新动向”，再度置人于死地，李旭旦先生首当其冲。《西北师范学院院刊》把李先生的复兴人文地理学的论文和“批判”文章同时刊登，更增添了对他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委托李旭旦和吴传钧先生担任人文地理学分册主编，1981年冬在上海举行大百科条目研讨会，李先生忧心忡忡，此时，吴先生劝慰说：“难道您

还怕戴第二次帽子?!时代不同了,不必理那一套!”

1982年2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人文地理的重要讲话,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特别把人文地理学列为要加强的薄弱学科之一,从最高层次支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使一度对人文地理持否定态度的“批判家”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为了适应人文地理学新发展,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杭州会议决定成立人文地理研究筹备组,推举8位学者为成员,李旭旦先生任组长;1983年5月在南宁举行首次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吴传钧先生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研究组,李旭旦先生为组长。198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专业委员会会议。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4年7月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人文地理讲习班,加速培养高校人文地理师资。之后中国地理学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学院又举办了几期人文地理师资培训班,使人文地理师资培训和科学普及成为全国性的活动。李旭旦先生作为首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抱病参加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做了“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讲话。李先生强调复兴人文地理学不是复旧,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准则,走正路,技术手段必须创新,论题内容要创新,要采取实地考察与社会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向人文地理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进军……。李先生因病没能出席人文地理讲习班,但他仍以教育家的智慧和极大的注意力关注这项活动。在张文奎、邬翊光、郭来喜协助下,他主编了《人文地理论丛》、《人文地理概说》两本论文集。

李旭旦先生的仙逝,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在吴传钧先生直接领导下,由鲍觉民、张文奎先生主持的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人文地理学研究教育与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和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更上一层楼。鲍、张两先生的辞世,又一次使人文地理学界蒙受损失!

综观近14年来,我国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85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在西安举办的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在无锡召开的中英日城市地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人文地理学研讨会;1990年8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会议;1990年11月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93年5月与沿海开放研究分会在昆明共同举办的沿海沿边开放学术研讨会;1996年11月与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郑州联合举办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1997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人文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1998年4月在北京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地理学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从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分立出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还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育与研究会,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使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空前活跃,人文地理已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列入全国高校的必修课,有的大学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了重点专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设置了博士点、硕士点。

近10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中英文版,1988)、《人文

地理研究》(1989)、《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等会议文集,吴传钧先生主编出版一套《人文地理学丛书》,创办了《人文地理》杂志(原名为《国外人文地理》)。一些学者还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专著,如《中国人文地理》、《现代人文地理》、《理论人文地理》、《人文地理概念》、《人文地理学》,以及多版本的《人文地理词典》等,还有更多的分支学科专著先后出版。一大批青年人文地理学家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中坚,使中国人文地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特别是以人地系统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共同关心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和核心地位更凸现出来。

钱学森先生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史出发,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时,明确指出以研究地球表层为对象的地理科学的内容与方法。他高瞻远瞩地指明:“地理科学是一门学科体系,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十大部门之一,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地理系统是开放复杂的巨系统”,要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来研究。地理工作者要树立“地理哲学”思想,从事“地理建设”,从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来建设“地理科学”。黄秉维先生认为,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要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充分运用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成果,从区域解释性描述和地理数据图表简式表述,向全球与区域的监测、规划、设计、调控、优化方向过渡,实现不同尺度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逐步达到钱学森先生所期盼的“地理建设”和“地理科学”的前瞻性设想。

鉴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丛书),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自然地理学及各主要分支学科方面的成就,如今编辑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既是体现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全面评估中国地理建设成就的需要,也是为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实现中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所必需。

自 1992 年酝酿、策划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以来,先后在北京、昆明做了多次协商,又于 1996, 1997, 1998 年分别在开封、西安和北京召开三次丛书编辑委员会,集中讨论了丛书编辑的宗旨、书目、纲要、体例、结构、分工和进度,确立了精而准、系列化、中国化的撰稿原则。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多位专家及其代表,一致表示争取在 1999 年完成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迎接 21 世纪来临的献礼。

借此良机,我谨代表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丛书编辑委员会,向为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做出贡献,参加丛书编辑出版,以及支持和赞助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1998 年 4 月 22 日于北京中关村

前 言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文化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在 1822 年 C. 李特尔便对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关系发生兴趣。几十年后，F. 拉采尔倡议研究人类文化地理，提出“人类地理学”一词。与此同时，P. 维达尔-白兰士在 19 世纪末提“可能论”时指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应与适应，则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

“生活方式”指的是什么？普雷斯顿·詹姆斯与杰弗雷·马丁在其《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出版，236 页）称：是一个人类集团的成员所学习到的传统品质——即人类学所用的术语“文化”。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民族的制度、风俗、态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复合体。

在上述思想影响下，美国学者 C. O. 索尔主张用文化景观来表达人类文化要素给地球表面打下的烙印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

作为《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中的《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的内容与体系如何确定，是本书写作之初就遇到的问题。从上面的地理学家的理解，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地理学当然是研究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一词，根据上述理解与学者认识，文化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思想意识文化。按马克思学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中，经济基础是物质生产，可以说是物质文化，上层建筑是包括制度文化与思想意识文化，都属于非物质文化。一般情况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在有的情况下，上层建筑亦可反作用影响经济基础。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中可以理解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可用图式表示为：

地理环境 ↔ 经济基础 ↔ 各种制度 ↔ 思想意识

地理环境 ↔ 物质文化 ↔ 非物质文化

地理环境 ↔ 文化

地 ↔ 人

以此图式可以说文化地理是研究地理环境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意识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目前的文化地理学著作来看，对文化集团的发展研究多注重其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关系。在文化专题上，地理学家多注意宗教、语言、民族、民俗及建筑与地理环境关系。从区域文化地理来看，则包括的文化范围比较广泛，凡是具有空间分布差异与特点的文化都可以涉及。这说明，文化地理所注意的文化，是以与地理环境有密切联系的文化。而不可能把所有的文化现象与内容都包括在内。

正是由于上述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本书分为三部分，即历史文化篇、专题文化篇与区域文化篇。历史文化篇内容约占本书 1/2。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没有中

断的文化古国，它有完整的资料记录了中华历史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过程，因此应当有一个完整的阐述。其次，因为中国的历史书籍很多，但是从文化地理角度看，以人地关系来系统介绍还比较少。再有，关于一些历史与考古的问题，由于文字资料、考古物证的不足或缺乏，难有定论。但是受西方各国研究所启发，地理环境是客观存在，即使与过去有变化，但有限度，可以用地理的分析作一些推论。由于多年的思考，不管对否，在此提出供研究。这样，对学地理的人，可以从我国自身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对我们认识今天、认识世界会有所帮助。

第二篇是专题文化篇，对宗教、语言、民族、民俗与建筑作了专题介绍，特别是分析其与我国地理环境的关系。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一般说，文明多与宗教相联系。我国有原始宗教，但没有发展成世界性宗教。道教还是在有外来宗教后才出现的。儒家不是宗教可是又向宗教靠，出现儒释道三教。我国的汉语方言极多，有些地方其差异尤如外语，但没有像西方往往因语言而分裂。这与同语言相关的象形文字有关。它不是拼音文字，它对我国文化统一、民族凝聚关系很大。我国是多民族，又是在彼此相关联的地理环境中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特殊的民族共同体。建筑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

第三篇是区域文化篇。这部分原请写过《中国文化地理》的王会昌教授执笔。但是，不幸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动笔就去世了。后来，请胡兆量教授承担。他在本书出版前已出版几本中国文化地理著作。由于这部分地域很广，各地文化差异大，所以，胡兆量教授又约请了一些熟悉当地文化的专家参与。尽管该篇只占本书约 1/4，但内容颇为丰富。

本书接受任务是 10 年前。先写《中国政治地理》，之后再写《中国文化地理》。因我学习此领域比较晚，历史资料相当多，掌握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写后两易其稿花了 4 年多时间。虽然每次易稿时都有收获，但仍感不足。只是希望开个头，能在不久以后，有更好的著作出现。一个文化古国的崛起，应当有高屋建瓴的总结自身的文化著作，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本书历史文化篇中的第一至第七章由王恩涌（北京大学）编写。专题文化篇中第八、九章由周尚意（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第十章由赫维红（云南师范大学）编写，第十一章由刘岩（河北师范大学）编写。区域文化篇中，第十三章第三节由韩茂莉（北京大学）编写，第十七章第一节由黄发程（华南科学院）编写，第十四章第一节由沈惠淑（延边大学，朝鲜族）编写，第十八章第四节由阿尔斯朗（新疆大学，维吾尔族）编写，第十九章第四节由琼达（西藏大学，藏族）编写，其余部分均由胡兆量编写。

本书是我们共同努力之作，是一种尝试，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与编审过程中，吴三保同志花了不少时间，费了不少心血，帮助修改加工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谨在本书出版之时，深表衷心感谢。

王恩涌

八十于北大中美园

2007 年 8 月 4 日

目 录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前言

历史文化篇

第一章 绪论	3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地理	3
第二节 中国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	5
第三节 文化地理学近来在我国的出现与发展	13
第二章 我国人种的形成与原始文化的发展	19
第一节 人种的形成与对环境的适应	19
第二节 我国农业的出现与特点	23
第三节 我国原始文化的发展	29
第四节 中国文明的起源	32
第五节 我国农业起源与原始文化发展的地理因素	36
第三章 我国的古代文明	41
第一节 神话传说时代	41
第二节 夏的探索	46
第三节 殷商与中国文明	48
第四节 西周与中国文明	52
第五节 春秋、战国的变化与环境	56
第六节 我国古代文明与环境	62
第四章 中央集权王朝的第一次兴起与冲突	68
第一节 秦的统一与两汉的变迁	68
第二节 三国、魏晋、南北朝由分裂走向统一	76
第三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化与地理环境	86
第五章 中央集权王朝兴起的第二次兴起与冲突	96
第一节 隋的重现统一	96
第二节 唐王朝的辉煌与没落	98
第三节 五代的更替与十国的并立	105
第四节 两宋繁荣中的困境	107
第五节 唐宋时的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影响	115
第六章 中央集权王朝的第三次兴起与冲突	122
第一节 成吉思汗所建的蒙古帝国与向外扩张	122

第二节	元王朝的建立与困境	123
第三节	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明朝	128
第四节	最后的王朝——清朝	135
第五节	地理环境与制度文化在元、明、清三朝兴衰中的作用	144
第七章	地理环境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149
第一节	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49
第二节	地理环境对秦以后诸王朝的影响	158
第三节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169
本篇参考文献		176

专题文化篇

第八章	宗教与信仰	181
第一节	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	182
第二节	主要宗教在中国的空间扩散	186
第三节	宗教与其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194
第四节	中国宗教文化景观	198
第九章	文字与语言	205
第一节	中国境内的主要语言及分布	205
第二节	汉语的产生和发展	208
第三节	汉语的空间扩散	211
第四节	汉语文化区	216
第十章	民族与民俗	225
第一节	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及其地理基础	225
第二节	地理环境与民族	230
第三节	民族文化多元性的保持	236
第十一章	建筑与文化	240
第一节	建筑与地理环境	240
第二节	园林建筑与环境艺术	243
第三节	和谐的人居空间——民居	248
第四节	特色建筑	255
第五节	新建筑景观的地理感受	259
第六节	中外建筑景观比较	262
本篇参考文献		267

区域文化篇

第十二章	文化区划原则与中国文化区划概要	273
第一节	文化区划原则	273
第二节	中国文化区划概要	274
第三节	研究中国区域文化的综合观	275

第十三章 华北文化区	279
第一节 首都文化	279
第二节 燕赵文化	289
第三节 三晋文化	291
第四节 齐鲁文化	293
第十四章 东北和内蒙古文化区	296
第一节 关东文化	296
第二节 内蒙古草原文化	300
第十五章 华东文化区	302
第一节 吴越文化	302
第二节 上海海派文化	306
第三节 八闽文化	309
第四节 台湾文化	311
第十六章 华中文化区	313
第一节 中原文化	313
第二节 安徽文化·徽商纵横	316
第三节 两湖文化	317
第四节 江西文化·兴衰轨迹	319
第十七章 华南文化区	322
第一节 岭南文化	322
第二节 港澳文化	325
第三节 八桂文化	328
第十八章 西北文化区	330
第一节 三秦文化	330
第二节 甘陇文化	333
第三节 宁夏回族文化	334
第四节 新疆文化	335
第十九章 西南文化区	339
第一节 巴蜀文化	339
第二节 黔贵文化	341
第三节 滇云文化	343
第四节 藏文化	346
本篇参考文献	349

历史文化篇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她的历史起点没有埃及和巴比伦那么早，但是，它却是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并列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文化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这一点引起世界许多学者的关注与不断的探索。另外，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经历过许多王朝的更替，好像舞台上的一幕幕的历史剧，尽管一幕幕剧中人物并不相同，但其内容却前后有相似之处。再有，中国这个文化古国经过多次分裂、外族入侵，可是她却仍然一次次又恢复统一。还有，很多文明古国的文化多是以宗教为代表，而中国的文化却是以礼乐的儒家为代表而名扬于世……。这些文化特点一直是中外学者探索的课题。

关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类：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指的这些地理环境中的自然富源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些特点也许能获得有意义的思索。这一点正是本书的重要动机。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地理

“文化”（culture）这个词的含义相当广泛，据统计，各国学者下的定义可罗列出上百种。在我国，“文化”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周易》，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这里“人文”与“以化成天下”，即以人伦秩序教化世人，使之自觉按规范行动^②。这种以文教化便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一词的基本含义。

在西方，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 B. Tylor, 1832~1917）在其《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中，称“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③从其定义看，文化内容十分广泛：其包括的全部知识，当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方面知识；其信仰、艺术、道德和风俗则属于思想意识，而法律则属于社会制度；关于“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就是说人的一切后天获得的文化。因此，人们通常将文化分为三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

①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人民出版社，1965。

② 冯天瑜，1990，《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页。

③ 爱德华·B·泰勒，1992，《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页。

质文化是指人们的物质生产及其产品的总和，例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交通文化等。制度文化是指解决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众之间的各种关系而制定的各种规范、准则、法律等。具体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精神文化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具体包括有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

这三种文化中，物质文化带有基础性。一般说来，物质文化决定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具有独立性，亦对物质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总之，这三种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很难分开。例如，一座建筑物，它所使用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物质，通过建筑技术而建造的，属于物质文化。但是，如我国传统的四合院这种民居，它的组合、格局与功能反映了我国传统家庭中的尊卑、长幼的关系及与几代同堂有关，是家庭制度的反映，属制度文化。关于建筑的装饰、室内摆设、家具式样，以及砖雕、木雕、石雕、字画等都属于艺术产品，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文化。这可以说，中国建筑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一体的典型，成为文化上的“三位一体”的载体。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这个同人类息息相关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一般分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分别研究这类环境的学科的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中又有分别研究地貌、气候、土壤、植物、动物等自然地理中各要素的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中又有分别研究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经济地理中各要素的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按其要素分出人种、民族、人口、社会、政治、文化、聚落、军事等地理学。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不仅有空间的差异，而且还有时间上的变化，既有上述的单一要素的研究，又有其多要素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又产生与之相应的区域地理、历史地理、部门地理（即上述的以要素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和综合地理。

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各文化在其起源、扩散的演变中与环境的关系及其所形成的文化景观。从总的来说，地理环境是文化发展的舞台，它直接的、间接的影响一些文化的发展。当然，也有些文化与地理环境关联甚小，甚至几乎没有影响。

以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资料中自然富源的土壤肥力为例，在土壤肥沃对农业产量影响十分明显的地方，由于土壤肥沃，相对与其他地区来说，在投入劳动力较少情况下，就可获较丰富的收获。这样，同一个劳动力就会比其他地区有更多的剩余粮食。在这种地区，也就会使较多的人脱离粮食生产从事其他活动。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就会快于其他地区。就拿四大文明古国来说，正是在农业的富裕地区，遂导致该地较早的出现文明。再拿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的金属、煤炭、水运、水力（瀑布）来说，这些正是早期工业革命所必要的条件。农业社会的生产基础与工业社会的生产基础，对其地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是否可以说，地理环境影响着物质文化，并通过物质文化又影响到该地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

再有，地理环境的平原、山地、草原及其内外交通便利与否，不仅影响到文化，还影响到这里的人是农业民族、牧业民族还是狩猎民族，以及这里民族由于交通情况而带来的开放与封闭程度，直接关系到该民族以后的文化发展。

当然，地理环境作为文化发展的舞台，它影响到人在该舞台上的表演，而且这个舞台也在不断适应演出而不断的“装修”。可以说这个舞台既是对表演的限制，也是在不断适应表演过程而经常进行“装修”。这个不断被演员为表演而进行的“装修”形成的形象，我们就称其为文化景观。在文化景观中，既包含历史的因素，也反映现实的影响。

可见，文化地理就是从文化的时空发展中探索人类文化与自然、经济和人文诸环境因素的关系。并注意人与地通过文化相互影响的作用所形成的文化景观。文化地理学虽然研究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但只注意与地理环境有关联的那一部分文化，并不包括文化的所有方面。

第二节 中国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在文化上持续发展没有中断的古国。其文化的发展与特征虽有很多因素，但地理环境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岸，背靠中亚高原，东临太平洋的西岸。按陆地面积计，我国约 960 万 km^2 ，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但是，俄、加国土大多位于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可利用程度低。中国却不同，其国土多位于温带，北有寒带、南有热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我国文化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

一、我国地理环境

1. 地形上山脉纵横，地势错落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高原、丘陵占国土面积的 2/3，平原、盆地只占 1/3。山脉、高原集中于西部，平原多在沿海，位于东部。因此，在地势上，是西高东低，由西向东依次下降，形成明显的三级阶梯。

山地的最高处，位于西南中国与尼泊尔交界处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其海拔高度达 8844.43m。喜马拉雅山与其北面呈东西横列的冈底斯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以及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东面南北向的横断山脉形成世界著名的青藏高原。它的平均海拔在 4000~5000m 之间，也是世界最高的高原，遂被人们称之为“世界屋脊”，它是我国地势中的最高的一级阶梯。在高原面上，虽然地面起伏不大，但由于海拔太高，其上的山地多为冰雪所覆盖，高原面下亦多是常年不化的冻土。我国最重要的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则分别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南、北山麓。高原上最重要的河流雅鲁藏布江则流在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之间，自西而东，最后流入印度洋。在其河谷中的平原，是西藏高原上重要的农业地区。高原最重要的城市拉萨就坐落在该河谷中。在高原上，东部因海拔低植被以高山草甸为主，西部因海拔高植被稀疏，多为高山冻荒漠。这些地方只能用于放牧。在青藏高原的边缘，由于海拔下降，降水增加，在缓坡与河谷阶地上发展农业，人口稍多，经济亦较发达。

在青藏高原的北面与东面，地势下降到 1000~2000m，形成一些盆地与高原，加上其上的山地，形成我国地势上的第二级阶梯。紧邻其北面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

其间有东西走向的高山——天山所隔开。塔里木盆地，南有昆仑山、北有天山、西有帕米尔高原，只有东部无山地所阻与甘肃西部相连。塔里木盆地多为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占据，流动性强。只有沙漠边缘与山麓地带，由高山冰雪融水补给所形成的绿洲，才出现农业发达、人口密集的聚落。汉时，经甘肃西部、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的绿洲向西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再到欧洲，形成早期的丝绸之路。因此，该地是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道。

准噶尔盆地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面，其南有天山，北有阿尔泰山，西有断续山岭，只有西向河流谷地与山口可供往来，东为平坦荒漠。盆地边缘及山麓地带受西风影响为草原，河水供应处可发展农业。盆地中部除荒漠外，还有沙漠与砾漠。

准噶尔盆地以东为吐鲁番—哈密盆地，多为荒漠，间有绿洲。吐—哈盆地东部与农业发达的河西走廊相连。由河西走廊再往东，是由西向东北方向延展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从祁连山东北山麓沿北面的蒙古国向东北延伸，直到东北的大兴安岭，其南则与黄土高原相毗邻。高原面上，除贺兰山、阴山外，地面平坦，起伏不大。地面物质从西北向东南依次为戈壁、沙漠和沙地。植被西部多荒漠，中部、东部多为草原，故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牧业基地。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由于黄河流过，利用河水灌溉发展农业十分有利，是重要的农业区，分别成为“塞外江南”与富裕的河套。

黄土高原在内蒙古高原以南，东部以太行山为界，南部位于渭河和洛河一带。这里除太行、吕梁、六盘等石质山地外，都是由厚厚的黄土所形成的高原。由于黄土的土质疏松，在流水的侵蚀下，原来顶部平坦的塬面遂被切割为支离破碎的一道道山梁，并使河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沙，致使下游河道不断淤积。而黄土的松散的特性则易于耕种，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加上合适的气候，黄土高原成为我国旱作农业的重要地区。特别是山西汾河流域与陕西的渭河、洛河谷地，很早就成为北方的农业中心地区。这与我国的原始文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青藏高原的东南部，除四川西部和云贵高原上的高山、深谷以外，还包括四川盆地。四川西部与云贵高原由于降水较多，高原上的河流下切，使云贵高原上形成一系列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谷深流急，地形十分崎岖，使东西向的交通十分困难。只有在河谷较宽阔的地方，形成面积不大的河谷盆地，可以利用为耕地，俗称坝子，成为人口集聚之地。云贵高原上，特别是贵州，多为石灰岩地区，喀斯特（岩溶）地貌十分发育，暗河较多。在上述深谷急流中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

四川盆地四面被山脉所包围，盆地中有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是“四川”名称的由来。盆地中河流的主流、支流纵横交错，不仅利于水运，而且形成许多河谷平原，对农业发展十分有利。盆地西北著名的成都平原，利用河水可以自流灌溉，农业发达，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长江东流，切割山地，进入湖北处形成世界上著名的峡谷，其三峡景观吸引国内外的大量游客。

在大兴安岭、太行山、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以东，地势下降到 1000m 以下，为广阔的丘陵与平原。这里是我国平原的集中地区。除平原外，还有海拔 500~1000m 的丘陵，只有一些山地或山峰超过千米。这些平原、丘陵和低山形成了我国地势上最低一级的第三级阶梯。向东一直延伸到海边。在平原中，从东北平原往西南是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丘陵广布，长江以南有江南丘陵、东南沿海丘陵与两广丘陵。

东北平原位于我国的东北，西有大兴安岭，东北有小兴安岭及黑龙江，东南有张广才岭、乌苏里江和龙岗山、千山、鸭绿江、图们江。东北平原被山河所包围，只有西南辽河下游才接触到海。其东北方向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后，经俄罗斯很长距离才能接触到鄂霍次克海。东北平原为我国最大的平原，面积 35 万 km^2 。平原内，北属嫩江、松花江流域，南属辽河流域，中间分水岭不明显。平原地势低平，起伏不大，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合处为三江平原，由于地势过低，出现大面积的沼泽湿地。平原西北，气候干旱少雨，加上土壤砂质、过度放牧与开垦，引起沙化。东北平原土地肥沃，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华北平原位于燕山以南，南抵大别山北侧，西倚太行山、伏牛山，东临渤海和黄海，是我国第二大平原，面积达 30 万 km^2 。按河流来说，从东北往南，依次有滦河、海河、黄河和淮河，因分水岭地形起伏不大，各流域间界限不明显，故使平原联成一体。华北平原地形平坦，土壤为各河流的冲积土所组成，土地肥沃，加上地处温带，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该平原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亦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为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地。但是，海河与黄河为多泥沙河流，极易淤积，特别是黄河下游地区，常因淤积而使河床加高，形成地上河。这里降水的变率大，当降水大而集中时，极易使下游地区招致水灾，甚至引起河道变迁，使该平原成为历史上水旱灾害的多发区。

长江中下游平原位于长江三峡宜昌以东的沿江两岸。从宜昌往东，既受长江影响，又受两岸水系的影响，使平原形成东西长、南北狭窄或时宽时窄的状况。沿江不仅是我国淡水大湖的集中地，而且也是小型湖泊群的集中地。在沿江平原与三角洲平原，由于地势低平、河湖水量集中、河道纵横，加上人工渠道、运河的交织，使该地成为河网密集地区，水运十分方便。长江中下游平原由西向东可以分成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苏皖沿江平原、里下河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平原，总面积达 20 万 km^2 。

两湖平原由江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组成。江汉平原为古云梦泽，由于泥沙淤积，现已完全消失。在沙市以东，汉水下游与长江两岸聚集许多湖泊。由于明时荆江大堤北堤阻塞，江水南泻，原洞庭湖面积日增。清中叶以后，江水所带大量泥沙进入洞庭湖，湖面又逐渐减缩，现已收缩到原湖的东与南两地，形成面积大为缩小的两个湖泊。鄱阳湖平原是由江西的赣、抚、信、鄱、修诸河淤积所形成。目前鄱阳湖面积也在缩小。苏皖沿江平原包括安徽到江苏镇江的沿江两岸的冲积平原，在北岸还包括巢湖周围的平原。在镇江以东的长江东北到黄河故道，运河堤以东为里下河平原。这里由于地势低洼，排水困难，易受水涝灾害。长江三角洲平原位于长江下游地区。长江北岸为狭窄带状，南岸包括太湖平原直到杭州湾北岸。这里河网密集，是我国水网地区。由于土质肥沃、灌溉方便，农业十分发达，人口密集，也是我国城镇密集地区。我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就位于长江口的黄浦江岸边。

江南丘陵位于长江以南的湘赣两省及浙西、皖南的丘陵地区。在江南丘陵中较大水系是湖南的湘江与江西的赣江。河谷平原是两省的人口与经济集中地区。其他丘陵区、河谷平原都较小。东南沿海丘陵包括福建全省与浙江的钱塘江东南地区。这里的河流都流向海洋，其形成的河谷平原，较大的有闽江、九龙江和瓯江平原。其他均为小的河谷平原。沿海平原入海处多为对外联系的港口，成为该地区的经济中心。两广丘陵包括广

东与广西两省区。两省区除属于西江流域外，广东东部则属于韩江流域。在广东的中心，西江与北江、东江汇合南流入海，形成丘陵区中一个较大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平原。

在第三级阶梯的陆地以外的海洋上尚有些岛屿。在辽东半岛南部有长山群岛；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有庙岛群岛；在长江口有崇明岛；杭州湾东南有舟山群岛；福建东面有台湾岛与澎湖群岛；广东的西南有海南岛；在南海中还有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上述诸岛中，只有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面积较大。

2. 气候上四季分明，类型多样

我国的气候的特点可以说是四季分明、类型多样。其原因在于一年四季中的水热的变化与组合。热与受太阳辐射的量有关，而辐射的量又受地面所处纬度不同，致使太阳正午的高度角的大小与昼夜长短不同。太阳正午的高度角随纬度而变化，纬度低高度角大、纬度高高度角小，所以高纬度地区接受太阳辐射量小，地面温度低，而低纬度地区相反，地面温度较高。可是，在夏季，北方纬度高的地区是昼长夜短，其白天太阳照射时间比低纬度地区长。正是这个原因，尽管高度角小，辐射量比低纬度少，但照射时间却比低纬度地区长，这就使得夏季的一日总辐射量在南北差异减少。在冬季，这种情况正好相反，使南北地面接受辐射总量差异增大。所以，在我国，受南北辐射总量差异影响，夏季时从东北到广州，人们都可以穿短袖单衣。在冬季，东北已是冰天雪地，人们住房需取暖设备，身穿厚厚的棉衣；而南方的广东，却仍然为绿树红花，暖和如春，根本不需穿棉衣。

我国各地的降水多少受气流影响甚大。我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岸，背靠大陆中心，东南面向海洋，深受东亚季风和西南季风环流影响。在冬季，中国西北的欧亚大陆的极地地区，地面寒冷，形成高压中心，而中国东南面的海洋上温度相对高，形成低压区。因此，冬季时，西北干冷的风吹向东南，不仅控制我国的北方，甚至越过长江，有时前锋可以达到广东。在这种寒流南下时，受地面温度影响，其强度逐渐弱，到长江以南已发生显著变化。在夏季，大陆受辐射增温，形成低压；而海洋水体增温慢、增温相对低于大陆，故形成高压。因此，夏季时，海面湿润气流由海洋流向大陆。

正是上述的辐射作用及其引起的温度在空间上的变化，形成气流方向变化，出现我国的季风气候。在冬季，从10月中旬开始，西伯利亚冷高压从北开始逐渐向南控制全国，它带来低温干燥的天气。过了次年1月，冷高压势力逐渐减弱，温度从南向北逐渐增温。这时，南方从海上来的湿热气流逐渐北上，春雨亦由南向北发展。在夏季，从6月到8月底，蒙古高压已不存在，海洋高压已出现，形成北上湿润气流，雨带从5月中旬由华南北移，6月到江南，7月、8月到达华北。当降雨带移到华北时，长江流域受副热高压控制，气候炎热少雨，而沿海地区则多台风，既受破坏，也带来降雨。在秋季，是南北气流变化时期，雨带从9月迅速南移，除少数地区外，9月、10月是天气晴朗少雨、秋高气爽的季节。到10月中旬，西伯利亚高压重现，从北而南又出现冬季干冷的西北风。

由于季风的变化，我国的四季分明。但东北偏北，冬季漫长，夏季短促；在江南、华南，夏季较长，冬季较短。在黄河流域，由于处于中间地区，四季较均衡。因此，在

季风影响下我国气候在地域上出现差异。大体上可以分出以下三个气候区。一是温带气候区，它位于东北。由于冬季漫长，夏季月均气温不高，降水量在 600mm 左右，作物生长季短，只能一年一熟。二是暖温带气候区，它位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北，长城以内的华北区。降水量介于 500~1000mm 之间。由于四季分明，作物生长季比东北长，可以两年三熟到一年两熟。三是亚热带气候区，它位于淮河、秦岭以南，夏季长，冬季短，降水量 1000~2000mm。生长季长，甚至作物全年都可以生长，一年可以两熟到三熟，以水稻为主。

在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以西的青藏高原和内陆区，因离海较远，是海洋气流难以到达的地区，所以降水十分稀少，形成气候特别干燥的地区。其中青藏高原为高寒气候区。这里由于海拔高，与同纬度东部地区相比，年均温相差在 15℃ 以上。降水量在 400~50mm 之间，呈西北低、东南高的分布状况。其气候特点是气温低，降水少，西北为气候干寒的冻荒漠；东南边缘的向阳坡与低地因受印度洋气流影响，温度较高，是降水多的亚热带的湿润地区。青藏高原北部的新疆、河西走廊与内蒙古西部等内陆区的高原盆地地区的气候，属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区。与东部同纬度地区相比，夏季温度高，冬季则稍低。在降水方面，除天山地区为 100mm 以上外，其他地区大都在 50mm 以下。因此，这里的气候以夏季的高温干燥为特征。在这种干燥气候条件下，多为荒漠地区，不适于农业生产。但这里高山上多为冰雪覆盖，夏季融化形成的河水，在山谷出口处及附近地区则可供灌溉之用，遂形成大大小小的绿洲，沿山麓地带排列。这种现象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特别明显。

二、我国地理环境与文明

1. 旱作农业与文明起源

文化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文明。人类的文化最早的是石器文化，到现在已有 200~300 万年。石器文化分三个阶段，就是旧石器文化、中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旧石器文化经历的时间最长，约有 200~300 万年；中石器文化经历只有 3000~4000 年；新石器文化也只有 4000~5000 年。其后出现的中国文明，到现在已有 4000 年。从文化转成文明，按夏鼐的说法：“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①。商代的殷墟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所以夏鼐接着说，它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②。如此，中国文明至今只有 3300 年。可是，有人推测在这以前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更古的、更原始的阶段，即一般所称的 5000 年的文明，“由于没有证据，这

① 夏鼐，1985，《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第 81 页。

② 夏鼐，1985，《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第 82 页。

只好作为一种推测而已”^①。

在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出现在殷墟这个地方？白克尔作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在《英国文明史》一书中，他认为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粮食必然丰富，有一部分人就可以脱离劳动从事智力活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里，他提出“地理条件优越”，“粮食丰富”，才有一部分人“脱离劳动从事智力活动”，促进“文明的发展”。可见，“地理环境”，“粮食丰富”是“文明发展”的基础。

在这里，地理环境是否“优越”是以能生产出丰富粮食来决定的。所以，环境与粮食的关系还要看是什么农作物。在埃及、巴比伦、印度三个文明古国是以小麦农业的丰产而取得的。小麦是原产于土耳其南部、地中海东岸与两河流域，这里是冬雨的地中海气候区，由于冬季温度不太低，而多雨，夏季反而干旱，故出现秋种小麦，第二年春末、夏初收获的两年生的小麦。埃及与印度两处虽无冬雨，但可用河水灌溉补其不足，进行小麦生产，因此与巴比伦一齐先后出现文明。

中国的季风气候是冬季寒冷而少雨，加上与两年生的小麦原产地较远，在既无其小麦又无与其相同环境下，只有选其他种类的农作物。从考古所发现的农作物来看，有黍、粟、水稻。黍就是黄米，粟是小米，都是耐旱的作物，水稻原是一种野生的沼泽植物。前者为旱生，在北方；后者喜水，在南方。

我国是季风气候，虽然夏季高温多雨，其水热条件有利于作物生长，但降雨极不稳定，特别是北方，春季降雨起始的早晚与雨量的多少往往决定于这些农作物的出苗与生长。只有出苗才能生长，出了苗，苗的生长好坏决定产量的多少；而苗能否出则决定产量的有无。所以，出苗是关键。为此，只有耐旱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茁壮。因此，耐旱的黍与粟被选作北方的农作物。黍与粟虽然是旱生的，但是风调雨顺时才能获得高产。因此，在北方，只有在河北南部太行山东麓，经郑州转西到渭河下游的马蹄形地带是最适合旱生作物粟生长的环境，可获得高于其他地区的产量。黍更耐旱，适于更北地区。加上其东南面向广大的平原，因此形成农业高产、人口集中的地区。

正因为上述马蹄形地区有丰富的粮食作基础，夏、商、周三代的首都都设在该地区，在其后的秦、汉、魏、晋、隋、唐与北宋都以该地为核心。只有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与五代十国南北分裂时，其政治核心地位才有所下降。在近 200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核心在北方，就是因为北方的华北平原上的旱作农业优势，提供了大量粮食与人口所形成的。在当时，东北平原除其西南部农业有所发展外，大多数地区仍是少数民族所居住，农业落后，人口稀少，在汉族政权中并不起重要作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当时由于水稻技术落后，产量低，人口少，政治、经济作用与北方不能相比，只有在唐中期以后，形势才发生变化。

2. 水稻农业与文明的持续发展

在秦岭淮河以南是平原与丘陵地区。在农业上，由于降雨多，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据考古研究，稻作农业最早出现于公元前约 5000 年的浙江余姚县的河姆渡与湖南澧县的彭头山。其时代与北方在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所发

^① 夏鼐，1985，《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第 81 页。

现黍、粟旱作农业时代相差不大。但是水稻是一种沼泽植物，它离不开水，水多了就会被淹，水少了就会萎蔫。另外，与水稻并存的杂草甚多，难以清除。解决用水、排水及清除杂草费力、费时，甚至需要一些工程，所以提高其产量比较困难，难以与旱作农业相比。这种情况，影响到南方的开发与人口的增长，使其政治、经济的发展落后于中原地区。在夏、商与西周时期，这里被中原认为是文化落后的四夷中的南蛮。在春秋时，楚、吴、越才在长江中下游参与中原的纷争。其中只有楚直到战国时始终作为一个重要诸侯参与争雄，而吴、越只在春秋时昙花一现，其后吴越之地终并于楚。到战国末期，楚亦为秦所灭，成为中原统一王朝的一部分。

这些以水稻为经济基础的南方地区，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单位面积产量低于北方的旱作，因此，也就影响到南方的经济及其所能支持的人口数量。例如，以西汉末年（元始 2 年，公元 2 年）的人口数量计，北方人口占全国的 81%，而南方仅占 19%。所以，南方的经济、政治的影响力远不如北方。

到了唐时，由于水稻种植技术的提高，产量随之增加，人口也不断增长，南方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亦比北方有很快提高。人口的南北之比为 40% 与 60%。在经济上，南方有了剩余粮食可以增援北方。正是如此，唐后期就依靠南方粮食与税收的支持才继续存在了较长时期。到元、明、清三朝，为了运粮到京师还专门修了大运河。南方由于经济基础良好，不但对王朝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也使文化的作用亦超过北方。以科举中的状元为例，南方往往占全国的 80%。根据以上情况来看，正是由于南方高温、多雨，生长季长的地理环境，且在水稻种植技术上得以提高，因此，南方的地理环境才使水稻农业在我国文明的继续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

3. 地理环境的多样型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基础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与气候的多样，其地理环境的影响在民族国家形成方面主要表现为生产类型与往来联系两个方面。

气候影响主要是在生产类型方面。在东部沿海平原，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雨有南北差异，且东部多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高温多雨的结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地区。而在不受东南季风影响的西部地区，由于降雨少，加上干热与寒冻气候，农业除局部地区的绿洲与河谷外，作物难以种植，当地居民只能依靠畜牧业生存。

在地形方面，西部地区，不是高原就是高山深谷或荒漠地区，在空间的距离上与东部相距过远，往来无河流可以利用，只能依靠陆路，人员往来已不容易，物资大量运输亦难以进行。

正是受上述环境条件的影响，在东部平原的西北地区，基本上都是以游牧为生的牧民。由于各地的环境的差异，其生产活动亦有些不同。在北部地区，南从长城到西伯利亚的泰加林带南缘，这里为内蒙古和蒙古高原。在植被上都是草原与荒漠。其南、北两边草类较好，故牧民放牧亦多集中于该地。由于牧民逐水草而居，地形平坦使其易于迁移流动。在历史上，汉、魏时为匈奴、鲜卑、柔然，隋、唐时为突厥、回纥，宋时为契丹、党项、女真所占，再其后至今则为蒙古民族所占。从秦开始，中原农业民族北上，而高原上的牧业民族南下，遂出现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漠南的河套地区及河西走廊地区，成为彼此争夺的中心地带，中原农业民族为阻止游牧民族南下遂在这里修建了闻名

于世的长城。

在西南的青藏高原及其东部边缘的高山峡谷地区，由于地势太高，形成特殊的高寒气候，不仅不利农业活动，而且低压缺氧，甚至使低海拔地区的人不适于在该地生活。正是这种原因，使该地的民族有极大的稳定性。在东汉时，中原才与其东部边缘的羌人接触并发生冲突。唐时前期青藏高原上藏族的吐蕃政权与唐有良好往来。在唐时后期随着唐衰落，吐蕃势力东下高原进到河西走廊和陇东。元时及其后，吐蕃加入中原版图后与中央政权有了紧密的联系。

在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在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其中部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缺水，人们难以通过。在西、北、南三面，有高山冰雪融水沿山谷而下，出山口出现绿洲，其繁荣的农业哺育着一个个聚落。这些山麓地带的绿洲相连就形成古时的丝绸之路。北面准噶尔盆地，受西风影响，平坦地面上出现稀疏草类，便于放牧，成为蒙古高原到中亚的通道。这种环境特点，使南疆以农为主，北疆以牧为主。正是这种通道性特点，给该地区带来极大的民族不稳定性、多样性和分散性。目前，南疆以维吾尔族为主，北疆以哈萨克族为主。另外，还有分散于南、北疆的回族和汉族。

南方丘陵与青藏高原边缘为少数民族集聚区。该地从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向西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到云南的丘陵与山地，当时均为百越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随着江南汉族人口的增加和北方来的移民，该地区的原居民遂向山区与西部地区转移。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目前，在东部，少数民族留下很少，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四川的西部与广西、贵州、云南的山区。由于丘陵、山地的地形分割，各少数民族分布在山区大多呈高度分散性。这里气候高温多雨，与西北不同，完全以耕种为生，在山坡上形成层层梯田。复杂的地形，使其少数民族种族极其多样。

东北地区，由东北平原及其周边山地所组成。因该地冬季过长，而且极其寒冷，农业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特别缓慢。从秦汉直到清初期，农业只是限于南部。北部以农、牧、狩猎为生，一些沿江地区，以渔猎为主。直到清朝后期才大规模进行农业开发。这里距中原的核心地区较近，而且交通方便，所以在其强盛时，即进入长城，建立辽、金与清的地区性或全国性王朝。

从以上情况来看，中国由于面积大，自然条件的差异，必然形成独特的区域地理环境特征。这些特殊的地理区域必然对长期居住于该地的群体产生影响，终于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民族。作为一个民族，须具备4个条件。首先必须有共同的地域，其次是共同的语言，再有是共同的经济生活，最后是共同的心理素质^①。

这四个条件中，关键是共同地域，所以放在首位。人类的群体，只有居住在相连在一起的地域才能彼此有紧密的联系与交往，通过联系与交往才有可能形成其共同的特征。居住在共同地域内的群体内部的人际交往必须以语言为媒介，结果便形成自己这一群体的共同语言。语言一旦形成以后，必然有利于这个民族群体内的个体间各种思想意识的交流。随着居住在共同地域内的群体劳动分工的出现，也就要求彼此进行物质交换，使得该群体内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影响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303页。

下，自然也就逐渐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正是因为共同地域为其最基本特征，我国为实行民族自治，遂根据各民族所在地域的大小、人数的多少，分别建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各民族虽然各有自身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是，如果地域较小，资源当然受到限制，其经济生产单调，产品缺乏多样性，往往难以满足生活多样性的需求。这种情况，在狩猎与畜牧业生产活动的社会里表现得比较明显。那里一般有较多的肉食、皮、毛，但缺乏粮食、布匹等，迫切需要农业社会的产品。而在农业生产活动的社会里有粮食、布匹，虽然缺乏皮、毛，但对生活影响不大，可以自给自足。

在我国周边的牧业、狩猎的社会里不仅需要汉族农业社会的粮食、布匹，还需要盐、铁（用于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茶、药材等物资。在明代，北方边界为贸易建立马市，在西南建立茶市，以进行商品交换。

在新疆、西南、东北等地虽然也有一些以农业为主地区，但地域不大、生产水平低，很多物品仍需汉族农业地区供应。在新疆地区，当时不仅需要中原的丝绸，而且还通过该地把丝绸传入中亚，甚至欧洲等地。新疆当时由于处于丝绸贸易的“丝绸之路”通道上，而大受其利。

汉族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使得彼此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更重要的是汉族地区经济富裕，物产丰富，对周边游牧民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其力量强大时，就进入长城以内，有的还建立独立的区域政权（如辽、西夏与金），甚至控制整个中原，建立包括其起源地在内的中原统一王朝（如元、清）。在这种经济交往、军事冲突的过程中，亦带来些民族融合过程，使得很多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中原，由于长期相处、通婚，使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血液中带来彼此的基因。从根本上来说，正是中国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多样性带来了多民族产生的土壤。不同民族的存在，虽然产生不少历史上的矛盾和冲突，但地理环境差异带来的经济上的互补又使彼此的联系不断增加。最后，在地理上的最低一级阶梯上的大平原，特别是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成为中华民族汉族的起源地，也是夏、商、周三朝的所在地与中华原始文化发源地。这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对周边民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这里也是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周边辐射的中心与基地。正是，这种向心的吸引力，向外的辐射，使中心的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发生经济上的互补与往来，人口上的迁移与混居，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最终形成政治上的汇集与统一。尽管两者曾发生过许多政治矛盾与军事冲突。特别是在元、清两朝，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建立统一的王朝，使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上形成的优势组合，使中原与周边地域形成紧密结合，发挥出强大冲击力，把封建王朝最后阶段的国力与图版达到最大阶段，对形成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一切都是该地域的地理环境与其上的人群间的人地关系以及各人群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果。

第三节 文化地理学近来在我国的出现与发展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相对出现比较晚的一门分支学科。关于人文地理诸现象的文化要素，如世界各地的种族、语言、宗教早就引起学者注意，并作过详细论述。后

来，德国的施吕特尔特于 1906 年提出“文化景观形态学”概念。接着，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于 20 世纪 30 年代认为解释文化景观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创立了美国人文地理学的景观学派。因此，在二战后，美国各大学地理系不仅把文化地理学列为重要课程，甚至取代人文地理课成为核心课程。

在我国，从 1949 年以来，人文地理被排除地理学，对文化地理的发展可以说处于隔离状态。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人文地理学在我国走向复兴之时，文化地理学才被介绍到我国。在 1985，《人文地理学论丛》中发表了钱今昔教授的“文化地理学与现代化建设”一文。该文不仅介绍了文化地理学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内容、研究领域，而且阐述其对我国现代化的作用与发展步骤。在该文影响下，文化地理学开始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

一、文化地理学在高等学校的发展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地理学界对文化地理缺乏了解，在高等学校中未有此课。在 1986 年春，我国首次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化地理学”课，把美国 T. G. 乔丹所著的《文化地理学》(The Human Mosaic)全面地介绍给学生。由于该教材观点新颖、体系合理、内容丰富，引起学习者的兴趣与注意。该课除正式列入北京大学教学计划，而且还通过讲学形式，向国内很多学校作了介绍。根据其教学的实践经验，王恩涌于 1989 年写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文化地理学导论》。该书是以美国新的文化地理学的框架体系来分析各种文化地理现象，这个框架体系将各个文化地理现象的时、空发展，与自然生态、文化整合的相互联系以及文化景观连成一体，给人一种完整的思路与概念。正是这一特色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与该学科的发展。

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其他文化地理学方面的教材。如 1991 年出版了夏日云、张二勋等 21 位教员（分属八所院校）共同编写的《文化地理》。该书共 16 章，包括范围甚广。谢觉民教授写的《文化地理学》也是 1991 年出版。该书是谢先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从美来北京大学讲学时的讲稿，继而编写而成的。该书共分 6 章，包括引论、人口消长、文化异同、聚落形式、物质文明、政治地理。份量不多，但很扼要。1995 年出版了两本文化地理学。一本是刘岩、路紫著的《文化地理论》，另一本是李慕寒、吴学典、朱传耿所著的《文化地理学引论》。两书都有其特色，前书以人群空间的景观分异（人种、民俗、语言、音乐）和生活空间的景观分异（建筑、服饰、食文化）见长，后一本以物质文化地理、艺术地理、人才地理较为突出。

最近，周尚意、孔翔、朱竑合作出版的《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内容比较新，除对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部分分别进行介绍外，对文化生态、文化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整合、文化的区域性、文化产品开发等作了专门介绍。该书反映了文化地理学的新进展。

1. 区域文化地理著作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国土面积大、具有鲜明文化特点的国家。其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不仅有地理学家的参加，而且更多为历史学家所著。第一本全国性文化地理是陈

正祥教授所写的《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该书首先阐述了“中国文化的迁移”, 在众多文化地理现象中, 作者突出了中国文化地理具有特色的城市的发展、长城和运河、黄土、黄土高原和黄河。另外, 对中国文化地理重要来源的“方志”、“游记”和“地名”作了深入挖掘。其中特别是历代人才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 虫王庙之分布与蝗灾出现的频率的关系作了杰出的分析, 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在此以后, 国内学者出版的作为以全国为对象的文化地理著作, 有王会昌所著的《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和赵世瑜、周尚意合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王会昌一书特点在于根据我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 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变化, 提出中国文化特点在于其内向性气质、和谐性风格、伦理性内核。另外, 以传统农业文化、少数民族农业文化、沙漠游牧文化和高原游牧文化来划分我国的各文化副区。赵世瑜、周尚意所著之书特别突出“人地观”, 中国文明起源及地理环境, 中国文化的趋异到趋同和人地关系。

《黄河文化》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主编之大作(华艺出版社, 1994)。该书介绍了中国文化起源的核心——黄河中下游地区, 从远古文化开始, 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进而转入夏、商、周三代的古代文化。接着阐述了从西汉至唐形成稳定的黄河文化中心时期的都城风采、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兴盛。其后介绍重心转移时期的黄河文化。该书最后是以北京为中心的黄河文化而告终。该书从黄河中下游地域的空间, 阐述了从新石器以来数千年间中华文化发展总过程, 是一部具有历史性的文化地理著作。

在省级文化地理方面有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和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司徒尚纪的著作不仅是省级文化地理学的杰作, 而且内容十分充实。其内容包括有: 广东文化形成因素, 广东文化起源、发展和传播,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与近代广东文化的变化。另外对农作、聚落、方言、风俗、宗教的文化景观、地名文化、人才地理、文化区划诸问题都作了深入分析。张伟然的著作, 除对湖南的方言、宗教、民风、民俗的空间分布作了分析外, 特别对影响湖南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行政建置和移民三个因素作了深入研究。

2. 历史文化地理著作

在历史文化地理著作中, 有宋新潮著的《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和卢云著的《汉晋文化地理》(1991)。殷商是我国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最早王朝, 但是, 更多地则是依靠考古方面的资料, 正是如此, 要在广大范围内进行研究是有很大困难的。作者对殷商时期文化分为三个文化区: 即中原文化区(其中心在偃师、郑州、安阳三角形地区, 外缘亦出现在湖北黄陂、陕西渭河流域、太行山东麓邢台及以北地区、山东济南); 北方与西北各文化区(包括燕山南北、陕甘高原、甘青地区、胶东半岛四文化区); 南方长江流域各文化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四川盆地三个文化区)。同时, 该书对当时商文化的辐射与汇聚作了分析。卢云著作的特色, 在于其对汉晋时代的学术文化的变迁, 滨海宗教文化带的三次浪潮, 婚姻形态的空间分布, 雅、俗音乐中心区变更作了深入研究。

张伟然的《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除对方言、宗教、习俗、民居注意外, 对该省历史上的特殊文化现象的“江汉好游”——女性形成的文化